

(中国话语丛书)
张维为——主编

人民 共和國

文扬 ◎ 著

读外传

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Horizon

(中国话语丛书
张维为——主编)

人民 共和国

文扬 ◎ 著

人民共和国

文 扬 著

出 品 人：姚映然

责 任 编辑：刘 硕

装 帧 设计：安克晨

出 品：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

出 版 发 行：上海人民出版社

印 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制 版：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890mm×1240mm 1/32

印 张：7 字 数：107,000 插 页：2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52.00元

ISBN：978-7-208-15105-5 / D · 319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民共和国 / 文扬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中国话语丛书 / 张维为主编)

ISBN 978-7-208-15105-5

I. ①人… II. ①文… III. ①政治制度—研究—中国
IV. ①D6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70744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52187586

文
景

Horizon

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建构中国话语

——“中国话语丛书”总序

张维为

中国以今天这样的规模崛起，人民生活水平以这样的速度提高，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闻的。一个国家的崛起一定要伴随自己话语的崛起，否则可能会功亏一篑、前功尽弃。回望中国崛起的过程，如果当初我们没有自己的坚持，而是按照西方话语去做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整个国家大概都会像苏联那样解体了，哪里还会有中国今日之崛起。

中国的崛起早已超出了西方理论和话语的诠释能力。过去30多年，西方对中国政治的预测几乎都是错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的误判除了有意识形态的偏见之外，还有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本身存在的许多深层次缺陷。金融危机、债务危机、难民危机、颜色革命褪色、“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以及西方世界层出不穷的“黑天鹅”事件等，其实都反映了西方模式和西方话语今天所面临的困境和危机。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西方话语这些年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影响却相当之深，特别在政治学、经济学、新闻学和法学等领域，造成了许多人只会在西方话语的语境下论述中国与世界，这就无法真正读懂中国和世界，也不可能讲好中国故事，更不要说与西方话语交锋了。

中国已经崛起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完全可以以中国人的眼光和话语来观察和评述自己的国家和外部世界。我们要建构全面的、透彻的、强势的话语体系。所谓“全面的”就是指我们的话语要能够解释中国的成绩、问题和未来；所谓“透彻的”就是要把中国和世界上的事情及其背后的逻辑和规律研究透并讲清楚；所谓“强势的”就是要强有力地回应西方话语的挑战。我们需要进行话语内容和形式的创新，建构包括学术话语、民间话语和国际话语在内的大话语体系；建构接地气的、有丰富学术含量的、能与外部世界进行沟通和对话的原创性的话语体系。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把“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作为自己的学术使命，我们力求通过原创性的理论创新和话语建构，从根本上动摇西方话语对中国的主流叙述。我们推出这套“中国话语丛书”，就是为了

不断地向外界推介中国话语原创性的研究成果。丛书以本院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为主，同时也接受其他优秀的研究成果，内容将涉及哲学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目的是通过颠覆性的原创研究，尽早构建属于中国学术界的话语体系。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型国家，她是延续五千年而没有中断的伟大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的重叠。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在大部分时间内都领先西方，中国落后于西方是近代发生的事情。今天中国崛起只是重返自己在世界上曾经享有的崇高地位。中国是带着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墨子、孙子等伟大先哲重新回到世界中心的，是带着五千年伟大文明并汲取了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其他文明之长而重新回到世界中心的。这样的国家当然要产生与其伟大传统和实践相适应的话语体系，我也相信越来越多的优秀学人会加入中国话语崛起这一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

仅为序。

2017年1月1日
于淀山湖畔

目 录

导 论 “共和国”的政治哲学含义 1

第一章 大一统国家与西式现代国家 29

中国历史上的秦汉国家，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大一统国家。反观西方，由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受圣经叙事、自然法思辨和“现代性浪潮”的影响，没有形成大一统国家。

第二章 人民共和国 77

为什么新中国会成为一个大一统的人民国家，与其说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所以中国才成为这样一个“人民共和国”，毋宁说是因为中国两千年来始终就是一个大一统国家，始终就有天下为公的传统。

第三章 公权力与私权力的平衡 115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国家，也是真正实现了公权和私权的合理平衡的国家。

…… 《管子》与齐国的“声乐政”与《乐》

附 录 中国思想系列 157

后 记 209

索 引 211

导 论

“共和国”的政治哲学含义

政体的观念

政体的概念，是舶来品，引申自古希腊政治哲学中的 politeia 这个词。根据王绍光的解读：“politeia 的词根是 polis（城邦），它指的不是物理空间意义上的集中居住地，而是政治意义上的公民共同体。由 polis 衍生出一个名词 polites，意指同属于这个共同体的公民；由 polites 衍生出一个动词 politeuo，意指像公民那样行为； politeia 则是 politeuo 的衍生词，其原意是指公民权、公民身份、公民的日常生活、公民与城邦的关系、城邦的政治体制。”¹

围绕政体这个概念，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概念自始至终都不在中华政治学术的主流观念当中。第一，它只是关于城邦国家这种很小的政治实体的政治体制，而不是关于“方千里者”

这种大国的，更无关乎“四海之内”的天下，因此根本没有进入中华先秦诸子的关注视野，也就没有进入中华政治学术的两千年传统。梁启超在 1902 年的《中国专制制度进化史论》中说：“政体分类之说，中国人脑识中所未尚有也。”吕思勉在 1929 年的《中国政体制度小史》中说：“政体可以分类，昔日所不知也。”第二，这个概念从一开始就带有形而上学的性质，与中华政治学术的思维方式格格不入。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中国人心目中所有者，近则身家，远则天下，此外便多半轻忽了。”²这种精神取向，难以发展出关于国家的形而上学。第三，近代之后，政体学说随西学大潮一起进入中国，从清末到民国这段时期，中国社会围绕着“共和”“帝制”“民主”“立宪”等概念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中国政治转型的进程，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一统国家重建的历史运动再次回潮，政体概念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又逐渐退出了主流观念。

西方传统中，对于政体最早的分类，是按照统治者的数量，一人统治叫君主制，少数人统治叫寡头制或贵族制，多数人统治叫民主制。

而民主制在那个时代并不具有道义上的优势，大多数情

况下被视为坏政体。生活在公元前 484—前 425 年的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一书中描述了波斯统治者内部的一场争论：一位名叫美嘎比佐斯的人认为，实行民主制是以一种恣意妄为取代另一种恣意妄为，君主是有知的恣意妄为，民众则是无知的恣意妄为。因此他提出，建议实行民主制的人其实是想加害于波斯，应该实行寡头制，因为“最好的人做出最好的决策”。而大流士则认为，寡头制倾向于制造内斗，终为君主制所代替；民主制往往恶意对待公事，直至有领袖出，制止民众，同样导向君主制。因此，君主制是最好的政体，应予采用。³

这是西方古典文献中关于不同政体之优劣的最早讨论，假托波斯王国中的对话，反映当时流行于希腊世界的观念。

到了柏拉图（公元前 427—前 347 年）的时代，雅典民主制已日益衰落。柏拉图出生于雅典的一个望族之家，亲历了自己的老师苏格拉底被雅典民主政权判处死刑这一悲剧事件，使他确信现实中的民主制已无可救药。“当我看到这些，以及其他种种，我衷心厌恶，决计与这个可耻的政权完全脱离关系。”⁴所以，他提出了一个政体逐级退化的说法，从“理想政体”退化到“荣誉政体”，再依次退化到寡头制、民主制和僭主制。在他的“理想政体”设计中，城邦的公民分

为三个等级——哲学家—统治者等级、士兵—护卫者等级和劳动者等级，若三个等级各尽其职，城邦便是“正义”的。虽然按照是否依法统治区别了三种好的政体（君主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和三种不好的政体（暴君政体、寡头政体、暴民政体），但究其本质，柏拉图仍是一位“人治主义”者，在他的设计中，最好的政体不在这六种政体之内，“在最好的情况下应该是人而不是法律拥有全部的权威，他掌握着统治的艺术并充满了智慧”。⁵“我反复思之，唯有大声疾呼，推崇真正的哲学，使哲学家获得政权，成为政治家，或者政治家奇迹般地成为哲学家，否则人类的灾祸总是无法避免的。”⁶

亚里士多德延续了柏拉图的思路，他在《政治学》一书中也把政体分成六种：王政（一人统治的好政体）；君子制（少数人统治的好政体）； politeia（多数人统治的好政体）⁷；民主制（多数人统治的坏政体）；寡头制（少数人统治的坏政体）；僭主制（一个人统治的坏政体）。前三种都是正义的好政体，后三种都是不义的坏政体。在坏政体中，民主制是那个最不坏的坏政体。

如果两千多年前就有中西交流，先秦的诸子百家，大体上会同意柏拉图更多一些，而较少同意亚里士多德。孟子曰：

“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孟子·尽心上》）这与柏拉图关于大多数民众并不拥有真正的知识，他们不过是拥有各种“意见”，掌握真理的永远只可能是少数人的观点是比较一致的。

中华传统中的“道”的观念，接近于古希腊的“真理”观念，而“德”和“礼”的观念，接近于古希腊的“德性”观念。从“道”的观念出发，以“德”和“礼”作为标准，不要说多数人统治，就连世卿、大人、贵族的“多君”统治，都不可接受，都被称为“非礼”。孔子作《春秋》，定“大一统”“讥世卿”二义，等于从根本上排除了民主制和寡头制在“大道”中的位置，所以根本没有讨论的必要。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道是天下万物之根本。所以，中国的君主并不是古希腊城邦的王，而是天下的天子、人间的人主，既要合天道也要合人道，一切为公；而中国的臣民，也不是古希腊城邦的奴隶和平民，而是身为天下人的人民，身为华夏人的百姓，同样也是既要合天道也要合人道，一切为公。虽然也称君和民，但与古希腊的君和民不能一一对应。

所以，如果不固守西方中心论，而站到中华传统政治的立场上看，西方的政体学说，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是一套只适

用于城邦国家而不适用于大型国家，更不适用于天下的“小理论”。在一个人口几千、最多几万的小城邦，寡头制和民主制都有可能，类似的情况在中国春秋时期的小邦国里也都出现过。然而，一旦发展为包括了很多城邦的幅员辽阔的国家，乃至发展为包括了很多国家的“六合毕、四海一”的天下，这些政体就不可能再是合理的政体，就成了非道、非礼、非公的政体。

政体学说只出现在西方而没有出现在中国，与其说是因 为中国政治哲学不发达，不如说是因为欧洲政治哲学不发达。欧洲希望统一，但从来没有实现过统一，欧洲希望强大但从来没能发展为一个大一统国家。而中国早于欧洲 1700 多年建成现代化的大一统国家，两千多年来始终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制度最成熟的大一统国家。这个基本事实足以说明，西方其实长期以来只有各种政体，而没有真正的国家。从一种“中国中心论”的角度看，全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才是真正的国家，唯一的大一统国家。

何为大一统？大一统对于一个国家价值何在？对于这个问题，自从五四运动掀起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浪潮以来就长期存在着一种否定的论调，一种认识上的误区，认为大一统就等于“封建专制”，就是中国长期黑暗和落后的根源。对于

大一统的解释，最多的就是引用《诗经》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此说明大一统指的就是绝对皇权，一人专制。

这种认识完全是受到了西方自由主义冲击，或者说诱导，属于数典忘祖。正本清源，大一统的确切含义，实际上包含在以下几段经典论述中，具有三个要点：

第一点与王权有关。按《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元”，指天之始；“春”，指地之始；“王正月”，指王之道与天之道、地之道三道同行。天地王一统，即为传统意义上的大一统。这是说王的合法性与合礼性。对于一个奉天道而行的国家来说，只有王一个人具有这种合法性与合礼性。这是由天道、天子、天下这个中国的“三位一体”所决定的，与西方狭隘的政体学说中所谓的独裁专制，毫无关系。